

## 摘要

宗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早在人类祖先进入文明门槛以前就已悄然产生在人类精神活动过程之中。伴随着人间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宗教的具体表现形态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处于经常的流变之中,形成绵延不绝的传统,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藉着参加国家教育部课题《中国宗教问题研究》的机会,以上海市基督徒信教原因为切入点,考察了基督教信仰原因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文章通过对近半年对上海国际礼拜堂的实地访谈和调查,以老年、青年、城市新信教群体为三个研究对象,希望能以时间的脉络来追寻随社会变迁而产生的不同信教原因。老年信徒信教大多是受家庭信教传统的影响,但也不乏年老孤独以及生活中遇到困难;青年信徒主要是受基督徒文化的吸引,也有对理想追求中受到挫折和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城市新信教群体突出体现了由于社会变迁过程中体制发生变化而带来的一种个体选择。

通过对三个群体的分析,本文认为当今社会的宗教现象已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应该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去理解和认识。在社会转型、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正逐渐打破原来中国社会的党政一体化,政社一体化,政经一体化的单一领导和管理模式。社会从封闭单一的肌体走向多元化,属于个人的空间越来越大,个体化的特征越来越突出。就个体而言,人们有了更多自己的选择,信教是个体化突出的表现。就社会而言由于各种社会机构职能的重组,教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又起到了整合个体化的个人行为,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由宗教极端化、神秘化带来的负功能。并且还可以从研究中引发诸如以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现代人的精神关怀;社会改革中的体制完善……

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是一个既十分有意义又难以研究的课题。本文只是试图从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地、粗浅地分析,研究中还有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还恳请各位老师和专家的批评和指正。✓

关键词: 社会变迁 信仰 文化基督徒 角色冲突 弱势群体

## Abstract

Religion, a special phenomenon of human beings, present in the mankind spiritual activities early as our ancestors evolves into civilized creatures. Various religions survive complic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form solid traditions and exert important influence along with mankind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national Education Ministry project "the Study of China Religion", this article serv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sons for believing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author researches those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in Shanghai.

The author has interviewed and investigated over 6 months three objective groups, the older and the youth and the newly-converted Christian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hurch, and found that major older Christians are guided by their Christian families, young Christians are mainly due to attraction of Christian culture and/or subject to certain frustration in life as to covert to Christianity, while the newly-converted Christians are right reflection of individual preference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se three objective group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religion phenomenon in modern society needs to be recognized and understood in correlation to whole social background, other than a separately isolated social phenomenon. During current reformation of old China patterns in economy and management, our communities and societies is undergoing an ever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x social transformation, tends to accept variety of thoughts, and leaves more room for different individualities. From personal perspective, preference of religion is a typical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Converting to Christianity is whatsoever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functions redistribution among various organizations from social perspective. Ecclesiastic organization can integrate sophisticated characteristics and hence, to some extent, stabilize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religion in extremism and mystification shall not be ignored, and shall otherwise promote the study of adapting religions to socialism development, for social intimacy, as well as to optimize social reforms.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belief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indeed intricate to study and has far-reaching meaningfulness. The author offers hereaft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which might not be profound and extensive, and sincerely welcome all kinds of comments.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belief, cultural Christianity, role conflict, weak group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原因、现状

宗教，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类而去。宗教消亡的问题在 21 世纪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它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仍将发挥重要的影响，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因为人们看到在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并没有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困惑和问题。经济发展伴随着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暴力犯罪、道德衰退、离婚率上升，而丰富的物质生活也与贫乏的精神生活形成反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体制的转变，使社会处于一种转型的时期，出现了传统社会中所没有的一系列新问题，而解决的办法一时还未出台或没有完全地消除这些矛盾。这样一方面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遭遇的种种矛盾和解决问题方案的缺失，另一方面则是宗教为人们提供的一种意义系统，使人们获得一种合理的解释和心灵的关怀与寄托。于是宗教问题便在社会中突显出来。藉着国家教育部的课题《当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佛教与基督教的融合与冲突》，使我有机会在这一领域进行调查和研究。选取基督教，是因为基督徒较佛教徒而言管理更规范化，并大多定期参加礼拜活动，便于做调查和访谈。选取城市基督徒信教原因这一角度作为切入口是考虑到城市信徒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矛盾和问题较有典型意义，能够反映当代信徒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信徒的研究是基督教与社会碰撞最直接和最激烈的焦点所在，也是许多非基督教徒看到信教人士数目增加的主要疑点。

近年来，随着学术讨论风气的形成和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使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首先是各种基督教书籍的出版和发行，使研究成为可能，也激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其次，有关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基督教的学术书籍，如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学术研究文集系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集、宗教社会学的书籍<sup>①</sup>，另外，各大院校纷纷成立基督教或宗教研究中心，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入手，探讨

<sup>①</sup> 这类书有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托马斯·奥戴《宗教社会学》等。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其中包括关于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sup>①</sup>；基督教实证调查研究<sup>②</sup>；基督教各层面的综合研究<sup>③</sup>。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当代我国基督教研究的学术水平。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从国内已出版的有关书籍来看，主要还是集中于史料方面，往往是通过查阅地方志、教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查阅，从不同角度入手对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的各个方面情况加以梳理。从研究方法来看，运用了历史学、宗教神学的方法较多而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则较少，有的研究即便是建立在实证考察的基础上，在分析的时候往往拘泥于问卷的数据，没有从中得出更深层次的基督教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结果。本文就试图克服这些前人的缺陷，用社会学和历史学以及各种可利用的辅助手段来对基督徒信教原因进行分析，努力探讨中国基督教及其信徒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二者关系的种种特点。

<sup>①</sup> 这类书比较常见的有史静寰、王立新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陶飞亚、吴梓明的《关于基督教于民族文化冲突的研究》、如董小川的《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等。

<sup>②</sup> 如1995—1996年杭州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组织的“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和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走向”的实地调查。它主要考察了1992—1997年间浙江、广东、福建一带的宗教现状，得出佛道教有世俗化倾向、民间信仰蔓延新兴宗教暗流层出不穷、基督教机遇与挑战同在的预测与分析以及李素菊和刘绮菲对北京市青年宗教热的调查等。

<sup>③</sup> 如卓新平、许志伟主编的《基督宗教研究》、卓新平主编的《宗教比较与对话》。

## 第二节 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上海市基督教徒的问卷调查、访谈、深入观察，同时利用和参考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和总结出当代人们信教的种种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微观和宏观的分析，探讨基督教、社会、基督徒三者的关系。论文基本内容如下：

1、老年信徒研究；2、青年信徒研究；3 城市新群体信徒研究；4 小结与问题讨论。前三部分都选择了有代表性个案进行分析，并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试图用一些理论进行解释，使得在阐明现象的同时也能抓住一些其背后所反映的本质问题。在以上海市基督教徒信教原因为中心进行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研究时，选取了老年信徒、青年信徒、城市新群体这三种特定人群，主要是考虑到这些人在基督教信徒中的比例，另外也是因为老年、青年、城市新群体分别可以体现传统社会的信徒、现代社会的信徒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特有的新群体这三种类型，以此来更好地反映基督教信仰原因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选择也是基于方便利用自己在有限时间内收集和调查到的资料，难免有武断和偏颇之处。最后的小结与问题探讨主要是对以上信教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些问题思考。由于研究的局限性以及问题的开放性，我们并没有下什么结论，而是在前面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毕竟，我们并不是为研究基督教信教原因而研究原因，而是为了从原因的分析着手为今后研究基督教、乃至宗教与社会、人的关系做好铺垫。

本文的重点在于阐述上海市基督教徒信教种种信教原因。

本文的难点在于探索当代基督教、基督教徒与社会及变迁的关系及问题。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方法、困难及意义

受欧洲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直接影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提出，应当采用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方法。而马克思则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应用到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去，使早期的社会学基本上沿着理论与经验社会调查这两个平行的、联系的方向上发展。二者的结合是以杜尔凯姆的《自杀论》为标志。他创建了理论假设—经验调查—检验实证研究程序，并采用了多种统计技术，将变量分析和多因素相关分析引入社会研究，为如何利用统计调查资料建立社会理论提供了范例。此外，他把社会事实作为客观事物来对待，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开创了客观分析社会整体及其宏观结构的实证研究传统。与前人不同的韦伯，提出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别，认为对社会现象虽然不能象对自然现象作客观的因果解释，但通过对行为的意义和动机的理解也同样能认识社会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所倡导的“理解的社会学”主张运用“理解类型”的方法对社会现象作出历史因果解释。

进入 20 世纪以来，社会学的经验调查方法逐步系统化、精确化。一方面是统计调查方法更为完善，统计学的各种方法大量应用到社会研究中；另一方面，实地调查技术也日益精密化、系统化。这使得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使之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主流。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人们对理性主义思潮产生了怀疑，对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些社会学家试图从现象学、语言学、语义哲学等学科中寻找更有效的分析手段或思想方法。加芬克尔的民俗学方法论就是尝试之一。他强调对人和社交关系的主观理解，主张通过日常观察、思辨来研究社会现象。

就本文而言，对于方法的选择是由研究的主题“人们信教原因”来决定的，因为宗教及其信仰所具有的特性其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抽象性。而在探究信教原因时，人们也很难将宗教意识、宗教情感和宗教心理表达清楚。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文献调查法，并适当地进行问卷调查作为辅助手段，在对信教原因进行解释性研究后，对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对于所取得的问卷资料，用 SPSS 统计软件加以科学的统计分析；对于观察、访谈的资料，用人类学的类型学方法和文化比较方法加以综合分析。本文努力做

到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结合，以经验研究为出发点，并为理论研究作准备，同时，又在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中又为经验研究的更加深入开拓新路。

这个课题的研究意义在于：1、方法论上的探索。传统的研究方法以文献整理和描述为主，难免呆板和陈旧。而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社会学量化研究的方法在宗教信仰、态度、经验等方面又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本课题力图使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和描述研究方法相结合，力求对课题有更公正、全面的把握；2、理论上的论证和思考。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宗教社会学体系，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宗教社会学家。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既可以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特别是从城市信教群体这一微观角度，以小见大，亦可以把这些理论体系放在中国的现实中加以检验；3、文化、社会上的关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心浮躁，各种思想、意识错综复杂，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往往容易被披上种种目的的外衣而利用，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力求使人们加深对基督教的认识，充分理解基督教与社会发展的相互适应的关系，使自己的观察和判断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本文的研究困难是由研究主题所形成的。时下，宗教问题虽然是社会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对它进行研究既有迫切的需求，又必须掌握好一个度的分寸。在实地调查中，宗教界的一些干部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原计划在某教堂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就因此而搁浅。在文章的论述中也要时时注意用语的轻重，以免失去了客观的把握。在课题的研究中，我往往陷入了这样一种身份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我是一名研究者，不属于基督教徒，因而无法得到基督教组织和有关部门积极地帮助。当我走进教堂与教徒交谈时，他们对我的谈话是以一种教徒和非教徒的角色对话展开的；另一方面，我又是以一名宗教问题的研究者去与非教徒进行交谈接触时，他们又是以一种无神论者和一个对基督教有强烈好感的人的角色与我进行对话。双重身份给我本身的思考角度带来了益处的同时，也给我的调查带来了困难。这种双重身份使我既可以接近基督徒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又可以站在一个非信徒的立场上，对基督教问题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和思索，从而对基督教信仰问题加以研究。

## 第二章 老年信徒研究

### 第一节 当代老人的一般状况

当人类叩开 21 世纪的大门，一个世界老龄化社会将展现在我们眼前。预计到下个世纪初，全世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 6.2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10%。<sup>①</sup>这标志着全球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世界的“银色浪潮”同样也影响着人口众多的中国。1996 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已达 1.2 亿，并以年均 3.2% 的速度递增。<sup>②</sup>预计到 2003 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 1.36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0.2%，中国将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国家。<sup>③</sup>

人口老龄化给传统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国体制转换时期，由于新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旧的靠单位养老的制度和靠子女养老的观念又正在瓦解，因此城市中的老年人面临着相当多的新困难和新问题。城市中特困老人的情况也许是反映这些矛盾的焦点，国内有关研究者指出<sup>④</sup>，目前这些老年人具有如下特点：1、从年龄特征来看，高龄老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低龄老人；2、从性别特征看，女性特困老人要大大多于男性特困老人；3、从文化特征看，文化程度低的特困老人的比例偏高；4、从婚姻特征来看，丧偶未再婚者居多；5 从家庭结构来看，生活在大家庭、主干家庭和三代家庭的特困老人人居多。

另一项对城市特困老人的调查从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了更加细致的描述<sup>⑤</sup>，在某市以 500 名特困老人为调查对象的结果表明：首先，老年人不但收入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高，而且日常的精神生活也很平乏。大多数老年人的闲暇生活以聊天为主占总数的 72.4%，看电视次之占 20.5%，经常是孤寂、空虚和无聊。其次，作为老年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是各年龄层次中最不容乐观的。绝大多数老人都会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这也是生理条件所决定的。500 名老人中，患有各种疾病的占 89.2%，无疾病者占 7.2%，不清楚者占 3.6%。第三，在生活照料方面，老年人主要靠自理占 72.1%，其次是靠子女占 14.4%，再次是靠配偶占 12.7%，而靠社会的极为有限，只有 0.1%。第四，在家庭关系状况方面，

<sup>①</sup> 萧振禹《世界面临的新挑战》，《人民日报》，1997 年 4 月 15 日

<sup>②</sup> 张文范《人口老龄化呼唤老龄产业》，《光明日报》，1997 年 6 月 9 日

<sup>③</sup> 杜鹃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一页

<sup>④</sup> 徐勇《城市特困老人生活及最低生活保障机制》，《上海大学学报》，1996 年第四期

特困老人家庭一半以上是不和睦的占 52.1%，一部分是家庭关系一般占 30.5%，家庭关系和睦的少于两成只有 15.4%。第五，心理感受方面，消极的心理感受水平偏高，积极的心理感受水平偏低。见下表：

心理感受指标	有此感受	从未有此感受
感到社会、家庭都疏远自己	76	24
感到烦闷不乐	64	36
感到生活空虚	67	33
感到生活幸福	18	82
感到社会、家庭都需要自己	14	86
对未来充满希望	12	88

第六，从生活满意度来看，对生活很不满意的占 72.6%，感到不太满意的占 12.9%，感到一般的占 8.4%，感到比较满意的占 4.2%，感到很满意的占 1.9%。第七，从承受力状况来看，通过用“物价上涨”这一变量的测试，47.9%的老人表示恐慌、紧张，50.3%的老人表示焦虑，1.6%的老人表示平静，无表示的占 0.2%，说明当前老年人的承受能力是相当弱的。

因此，不难看出，城市的老年人已经成为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弱势群体。他们显然需要社会更多的关心和支持他们的物质、精神生活，这不仅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市养老保障体系，还需要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老年生活照料体系、发挥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然而，每一项机制，每一种体系的建立又何曾是一蹴而就，一顿足一拍胸就信手拈来的呢？从调查、讨论、制定、试点到最后的推广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老年人该怎么办呢？他们又如何去面对生活，适应社会的变化呢？或许，走进教堂成了他们的一个选择。

<sup>5</sup> 陈成文《社会弱者论》，时事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7页

## 第二节 老年信徒信教原因研究之一：基督教家庭的影响

老年信徒由于其年龄特征所决定是所有群体中受历史影响最深的一个，因此，在分析他们信教原因时，首当其冲地便是基督教家庭的影响。

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基督教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和传播，它对人类各民族文化、对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发展都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基督教始于古罗马帝国时期，在欧洲中世纪里几乎占据了整个社会主流文化。以后，随着西方现代化浪潮对于非西方地区、民族的波及，它的文化影响也逐渐传布至全世界。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基督教第一次在中国传教是从 635 年阿罗本进入长安到 854 年唐武宗灭教，历经 210 年。第二次是在元朝，随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而复兴起来。当时称之为景教、“也里可温”，在蒙语中是“有福缘之人”的音译。1368 年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禁教的政策，从而使在华的基督教势力再一次被消灭。基督教第三次来华是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期间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利玛窦、龙华民、郭居静、熊三拔等。但到 1723 年雍正登基后，开始了百年教禁，基督教又一次在中国销声匿迹。基督教最终在中国传教取得成功是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枪洋炮的打入中国的。进入中国后基督教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传教方式，积极开办学校，通过各种方式把基督教输入中国。于是中国较早的一批基督教家庭产生了，他们代代相传，特别是在传教士活动频繁的沿海地区和一些传教较早的地区，形成了相当一部分的基督教家庭。这些家庭对子女的要求，自然会促使相当一部分人走向教堂。这种情况，在老年信徒中占了很大比例。这些老人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对基督教有着很强的虔诚度和丰富的救赎体验，并且对外来事物的判断尤为谨小慎微。而对教会的依赖和信任感超过了家庭和社会，在行将“升入天国”之际，这种虔诚和信赖更为明显。在我们的访谈中便有这样的实例。

张老太太和杨先生是我们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访谈中较典型的个案。

出生于 1909 年的张老太太今年已是 92 岁高龄，原来家住上海郊区金山县，后来由于父亲做生意的缘故搬来了上海市居住。她说，在她小时候家庭非常富裕，家里有佣人伺候他们，儿子都到外面上学和父亲学做生意，而女儿只能留在家里学习绣花、做衣服，也学习认字。“后来家庭不好以后，我嫁了人，就是靠做衣

服过日子的。今天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做的。”张老太太无不骄傲地说。从我记事起，每天母亲都会带我们做祷告，每个星期天全家会去一个牧师家作礼拜。我当时非常愿意去，因为，每次去在做完礼拜以后，都会有很好吃的东西分给我们。我受洗听母亲讲是小毛头的时候，他们认识的那个牧师来中国就帮我入洗了。后来，长大以后就去教堂作礼拜。我很喜欢教会生活，因为在小时候家里人不让我出门，只有去教堂才可以认识许多人，我的朋友都是教徒。后来，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也是教会的朋友从国外带东西给我们，教会帮助我们躲日本人的炮弹。再后来，解放了我们家还是和外国朋友有交往。文革的时候，我们家虽然不去教堂，但是还是在自己家里做祷告。现在好了，又可以每个星期来教堂作礼拜了，而且还有那么多人开始信教。我的孩子现在也都是基督徒，我很高兴。

张老太太皈依基督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什么一丝一毫的不合情理之处。在基督教家庭中成长，从小就受洗，一生都伴随着基督教的庇护，一辈子都感不完的恩惠，以至代代相传，这不得不说是基督教家庭信教的一个经典案例。如果这样的例子只能反映传统基督教家庭中一个传统的信教类型，那么，杨先生的经历则可谓是历经思索的结果。

杨先生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他少年时便从家乡南通只身来到上海。十几岁少年在异乡的无助使得他不得不投靠父亲介绍的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教会朋友。虽然这位朋友帮助他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但是执拗的他还是没有受洗入教。“因为我觉得我还分不清这是好还是坏，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劝我信教的人自己都是教徒，他们虽然帮助我，但是一旦我信教他们还会帮助我吗？他们会要求我去无偿的帮助别人吗？”家庭显然对杨老先生的做法很不满意，认为他是被撒旦抓住不放的孩子，上帝也将最终抛弃他。所以，家里就不让他再多接触基督教，只能默默的替他祷告。每次他得了什么福，家人总会说是上帝在行使力量，每次他受了难，家人又说是撒旦在作孽。“我当时觉得好象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人只是在判断，那些行为是善的神做的，哪些行为是恶神做的。那么，人还能做什么。”张老先生激动地说。可是，问题就在这儿。我大约是十几年前信教入洗的，我发现基督教的确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组织，并且是有自己的目的和规章制度，但它的主旨是好的，是教人行善，教人相互友爱，它的组织是帮助人们解决困难的。所以，我最终还是信了教。但我不是真的相信

这样一个神而是相信有这样一个组织和行善的信仰，从而使人们能够有根据的做好事，从心里想行善事。我的家里人知道我入洗后，十分高兴，但我总觉得我信的教和他们信的教有所不同。我的孩子也不是全信教的，但是我依然希望他们将来有一天能信教，因为这会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好人。

杨老先生的话的确与众不同，基督教在杨老先生眼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具有一定的是非象征意义。信教是好、善的表现，不信至少是好、善的不完全。而且，当今的社会也需要这样的组织来帮助人们，不仅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还有那些帮助别人的人本身，也是需要这样的组织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托和精神的支柱。

同样是基督教家庭中的基督徒，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和皈依原因却依然有如此大的差距。这样的不同，势必会影响人们的实践行为。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家庭传承的宗教传统仍将继续。在对上海国际礼拜堂参加唱诗班的青年调查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教徒的子女，其中有的已是第三或第四代教徒。这些青年有的在1980年后才受洗入教，但是他们都自幼受到宗教生活的熏陶。可见，这种家庭式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依然是信徒信教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①</sup>

---

<sup>①</sup> 据对莆田大教堂短训班的学院调查，九十一名学生、学员中，有七十五人来自教徒家庭，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四。

### 第三节 老年信徒信教原因研究之二：身处困境中的诉求

老年人由于生理的原因，已经走出社会的大舞台，主要在家中和自己生活的社区进行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在身体上又日渐衰微，行动不便，造成了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普遍的需要护理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各年龄层次中，困难最多的一个阶层。经济上，往往依靠子女或靠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身体上，常常是疾病缠身；家庭关系上，存在着显性或是隐性的矛盾；社会关系上，往往是被遗忘的“角落”。然而，他们却往往并没有成为最受到人们关心和帮助的群体，甚至是遭到了冷落。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看到的，当今的老年人的确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与社会上普遍的情况不同，基督教教会中的老年人却十分活跃。每个教会中都会有专门的负责老年探访的组织来帮助老年信徒，共同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进行访谈时，这样的例子也遇到不少。每次去教堂作礼拜的人中总少不了有一些推着轮椅的老年人，他们有的是因为年纪大了行动不便，有的是因为生病无法走路，赵女士便是其中一位。

今年 55 岁的赵女士是去年刚刚入洗的。45 岁那年她不幸得了脑瘀血，通过医治命是保了下来，但是由于有一根血管受到压迫，下肢再也无法动了。从那年起便下了岗，在家里的轮椅上度过终日。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更拮据起来，女儿在念中学，正是花钱的时候，丈夫的单位效益也不是很好，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1000 元左右。赵女士不甘心屈服于生活，于是便求人在街道找活干。终于有了一份在街道办的小店里卖东西的活，之所以会让她干是因为她要的工资最低，每月的固定工资 400 元另加一些卖货的提成。365 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有时丈夫下班回来还要帮下忙。“那时候，有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经常到我这来买东西，她说她住在不远的另一个里弄里，凑巧路过这个小店就顺便买一些东西。可是，她几乎每天都来，有时不买东西就和我聊天，帮我卖东西。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当时我就知道她是基督教徒，因为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去教堂作礼拜。我没想信教，因为怕是什么不好的东西。有时，星期天做完礼拜，她就带着小姐妹们一起来看我。帮我的忙。”“过了两年，我的工作没有了，因为街道要改造，小店也将拆掉。女儿要考大学了，我在家帮她料理生活上的事。王阿姨有时也来看看我们。50 岁的时候，我的病又犯了，住进了医院，女儿在读大学。

家里是一点钱也那不出来，是王阿姨又是送饭又是借钱。原单位报销医药费经常是一拖再托，是王阿姨帮我跑了不知道多少次。”“动手术那天，王阿姨和她的姐妹们都来为我祷告，虽然当时我还不信教，但是，我也想手术成功，于是也祷告。手术成功了，而且恢复得也很好。从此，我和王阿姨以及她的姐妹们成了好朋友。”

“我一直不太敢信教，怕有什么迷信报应。但我开始看一些基督教的书籍，象《圣经》、《天风》，因为和王阿姨的朋友在一起她们谈得最多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后来，我就喜欢上了《圣经》，觉得它讲得很有道理，教人怎样做人，做好事。王阿姨和她的朋友们就是在按照上面说的去做。但还是有一些看不懂。前年，我参加了教堂的慕道班，去年入洗。现在，每周都来参加礼拜。认识了许多朋友。心情也好了起来。这里还有几个和我得了同样的病的人，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相互帮助，讨论病情。”

从陌生到相识，从惧怕到皈依，赵女士走了一段“因祸得福”的历程。生病并不是老年人遇到的困难的全部，而只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目前社会上的许多老年人都需要帮助，或许只是一些买米买油的小事，或许是面临生存危机的经济问题。无论是什么，我们都不容忽视，因为他们为社会贡献了一生，他们理应有这个要求晚年生活得到保障的权力。基督教徒在有意无意中帮助他们，向一个人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援助的手，最终使他出于感恩也好，出于信仰也罢，其结果便是被同化了，进入了这个帮助人的良性循环体系，运转起来。<sup>①</sup>

---

<sup>①</sup> 以福建省莆田大教堂为例，他们的四个主要机构：堂务组、财务组、青年组和教务组中的教务组就又划分了专门的老年探访组。探访组的成员大多是由一些退休人员和有工作闲暇的人员组成。每当有信徒生病或家里有什么矛盾，他们便会前去探访，使病痛及精神不悦的人感到有支持的力量。这些义工是不取分文的，他们认为这是在给上帝做工。而被帮助的人度过困难之后，也将这一切的功劳归功于上帝的帮助，因此当以后别的信徒遇到困难时他们也会去义务地帮助别人。这种不断感恩的心情在上帝的名义下，把帮助者和被帮助者紧密地联合了起来，形成了良好的互助关系，而所有的荣誉不属于任何个人，全归上帝，从而使这一良性互助关系得以延续。值得一提的是探访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形式，因为这些成员多为退休人员，他们通过探访活动发挥了余热，使得心中显得充实，人生丰富的经验得以使用。以来与这样一个促之，他们相互切磋，相互帮助，把自己和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消除了孤独寂寞感。

#### 第四节 老年信徒信教原因研究之三：寻求精神的慰藉

老年人的精神世界是十分丰富的，他们有漫长的经历和敏感的心灵。然而，他们的这种精神的寻求往往被忽视或是被抑制。自己的孩子正出于事业的顶峰，日夜奔波操劳；自己的孙子正忙于学习，埋头题海。作为一个老人自然不希望自己影响了孩子们的工作和学习，然而这丝毫并不能抵消内心的孤独和对精神上关怀的渴望。于是，有些老年人即便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仍然会养一只宠物，和宠物说说话，带宠物出门散步，给宠物做衣服烧饭等等。从社会的大舞台上退出的老年人们并不想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作为人，他只有在感到别人需要你的时候才会有价值感。作为老人，虽然年近人生之黄昏，也总希望自己依然有用。

精神的慰藉对于老年人的心理显得尤为重要，在国际礼拜堂的访谈中有一些老人信徒就是出于精神的需要而信教的。这些人的普遍特点是信教时间不长，文化水平较高，退休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沈老师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今年 55 岁的沈老师原来是一位中学教师，退休后在家一直没有什么事做。家里只有老两口，独子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平时非常忙。孙子上的是寄宿制学校，只有星期天才来看奶奶。儿子又为沈老师请了一个保姆，平日还会给一些钱补贴家用。沈老师可谓是衣食无忧，在家看看书，读读杂志，街道有事总是有求必应，是个热心肠。然而平日里操惯了心的一个 40 多人的班级的班主任，这一闲下来反而不自在起来。开始抱怨儿子、孙子没良心，不常来看奶奶，真的来了，又赶他们早早地走，唯恐耽误了他们什么。“人家都说我有福气，其实谁又知道我心里的苦闷呢？”于是沈老师开始寻找各种老年人可以参加的活动，除了早上有一些人锻炼身体外，其他时间几乎都是各忙各的，她依然孤独。后来她发现了楼下的李阿姨，整日忙忙碌碌的，还有很多的姐妹找她。“我知道她是基督教徒，而且信教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本来认为这种搞封建迷信的东西是不对的，所以一直没有参加她们，也从不打听她们在干什么。”“有一次，她们响应居委会的号召‘小区是我家，清洁靠大家’的号召，在打扫公共卫生。正好我也在扫楼梯，就认识了。她们还约定以后每个星期一人们上班后都来打扫。我开始不太相信她们会做到这一点，但事实证明她们真的做到了。我对她们就产生了好感。每个星期一和她们一起打扫卫生。”“接触多了才发现她们都是很好的人，没有什么搞封建

迷信的活动。我看了《圣经》，也去了教堂。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这里的人们都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后来，我也信了教就再也没有闲过。别的姐妹有事，我们要去探访，替她祷告，帮助别人。有时还要组织各种义卖来帮助社会上有困难的人。”“信教后，最重要的是心情好了很多，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用，可以帮助很多人。”

“养尊处优”并不是沈老师的特点，即便是家境一般的老人也会产生这种孤独感和无用感的情况。一方面是有许多这样的人需要关心和帮助，另一方面是有一些人渴望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教会的一些组织机构，将二者可以很好地结合。

其实，老年人由于精神上的需求而对基督教产生好感正是基督教或者说是宗教心理调适功能的表现。正如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原始宗教的功能时指出，原始社会的巫术使人“在愤怒、仇恨、单恋、绝望和恐惧出现的情况下，能够确有把握地保持心理生活的完整稳定。巫术的功能在于把人的乐观主义仪式化，使人信心百倍地以希望战胜恐惧……没有巫术的力量和指引，原始人就无法顺遂地克服困难，无法达到更高的文化。”<sup>①</sup>不光是老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或许可以称之为弱势群体<sup>②</sup>的人信教，主要就是因为基督教的心理调适功能。它通过给人们彼岸世界的描绘，使人们有了一个清楚的终极归属，从而不再惧怕死亡和现实的苦难；通过爱的教义的宣讲，满足了人们在孤寂的人生道路和无情的制度下心中对爱的渴望和抒发。

<sup>①</sup> 《巫术、科学和宗教》 马林诺夫斯基， 天国出版社，1948年英文版，第70页

<sup>②</sup> 这里指的弱势群体是指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所以，这些人不仅包括我们提道的老人以及后面将提道的下岗工人和民工，从上述意义上来说一些在社会中有较好收入的白领由于其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而也可以被认为是弱势者。

## 第三章 青年信徒研究

### 第一节 青年人信教的社会背景和个体因素

青年基督徒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的产物。始于 80 年代的青年宗教热是人们长期的思想禁锢向往自由的生活空间,紧闭的国门和人们眼界打开的必然产物。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青年人,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里,也经历着社会从经济到文化、价值观、信仰等全方位的多元化倾向。人们不再是步调一致,着装统一,按部就班地生活,而是在竞争与选择中追求人生的目标,展现生动而多彩的生活画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使青年人选择宗教信仰成为了可能。而中西文化的碰撞后青年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又增加了这种倾向的程度。据统计,我国宗教信徒中的 70%—80% 为改革开放后 80 年代以来入教的。而青年宗教信徒约占信教人数 30%。也就是说,假若把青年信徒全部归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入教的新教徒,那么,除去青年信教者,仍有 40—50% 的新信徒是非青年。<sup>①</sup>因此,与其把青年信教作为一种热来看,不如把青年的信教热潮作为社会各种热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来看。

青年信教不仅是反映了社会的状况,也是由青年自身的主体特点所决定的。青年人的思维活跃,富于幻想,充满好奇心,使宗教中描述的神仙境界、世外桃源有很大的诱惑力。而且,青年人反传统的逆反心理强烈,对社会亚文化的关注程度往往十分高。加上旺盛的好学求知欲,使他们对宗教的学习成为了一种现实。青年人对不同宗教的看法往往也是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把自己与传统相区分,在调查中发现他们一般认为佛教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而基督教是先进的代表。这恐怕与基督教的西方背景和青年人思想中无意识的崇洋媚外不无关系。

<sup>①</sup> 《青年与“宗教热”》 李素菊 刘绮菲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 第 18 页

## 第二节 青年信徒信教原因分析之一：好奇与赶时髦

如果说老年人信教原因中反映出更多的是历史的积淀和生命本身的局限，那么，青年信教则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它包括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和青年人自身的特点，二者的结合或许就构成了青年人信教的缘由。

因好奇而接近基督教占青年的大多数。对于年轻人而言，到教堂与游览其他名胜古迹没有什么区别。在过惯了传统节日后，西方的一些节日，诸如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等成了年轻人的聚会。因为在这一天，不需要和家人团聚，而节日几经商家的炒作也丝毫不逊于传统节日的气氛。于是，年轻人便纷纷利用这一天向爱人、亲人、朋友表达自己浪漫的祝福和美丽的心愿，既有时代气息又体现了自己的品味。在这些节日中，圣诞节是西方最大的节日而且又临近年末，当青年人看到平日只能在童话书中看到的圣诞老人、圣诞树、各式各样的圣诞礼物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时，自然便欣然地欢度起节日来。

这种情况对于上海的青年来说更是突出。解放前上海是各西方国家的租借地，改革开放后又是各国外企的主要贸易城市之一。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传统和上海特有的商业氛围，使这里的青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文化，也引起了他们更大的好奇心和新鲜事物的兴趣。2000年的圣诞节是世纪之交的基督教盛大节日，这天各教堂都人满为患。到西藏中路的沐恩堂只是下午3点，然而前来教堂的人已经络绎不绝，有基督教徒，也有非基督教徒。我找了3位时髦的青年聊了起来。他们并不信教，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来教堂时，他们说，“圣诞节，是基督教的节日，正宗的过节方式就是来教堂过。”我又问他们对基督教的感受，他们说道，“基督教并不是什么坏东西，我认识几个教徒，人就特别的好，好得都有点傻兮兮的。”“基督教是外国的东西，不是我们中国的，所以中国政府并不同意它的发展，许多中国人也不喜欢它。”“但是基督教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节日，这倒是挺好的。”从他们三三两两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们的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存在。正如他们会关注社会上其他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一样，他们也关注于基督教，特别是它的节日。

如果说参加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并不能说明这些参加的青年就信教，那么，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活动使青年人走近了基督教。当他们遇到什么问题或困难时

便又多了一个选择的求助对象。<sup>①</sup>

有的教堂为保证圣诞子夜弥撒的进行，组织教徒自当天下午便开始为参观者服务，做好参观者疏导工作。<sup>②③</sup>

青年人年龄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对身边新鲜事物的好奇，在追求时尚的从众心理的驱动下，特定条件的触发便可能把他们导向基督教的信仰中。从青年人在信教中扮演的角色来看，是社会所创造的宽松环境、信仰自由才使青年人有可能自主地选择自己所要的东西，社会改革中个人自由的突出又使个体化加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信仰基督教可以看成是个体化在社会思想、信仰体系层面的反映，是个体化的个人在体现独立自我时的一种方式。

<sup>①</sup> 国内有关学者对北京市的教堂圣诞夜做了调查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西什库的天主教北堂，一个圣诞节光顾的人员就达4万人；而位于北京市宣武门的天主教堂仅1996年前往参加活动的就有39所大学的学生，中学生还未在统计之列。研究者统计，参加圣诞节活动的大多数人并非信徒，信教人员只占不到20%。来参加的学生中多数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进教堂仅为一次，就是在圣诞期间。可参阅李素菊、刘绮菲的《青年与“宗教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8月版

<sup>②</sup> 位于北京市西四地区的基督教缸瓦市堂，每年圣诞夜组织的庆祝活动开始于晚7点钟，但为能确保参加活动，许多人中午过后就到教堂内占地儿，常常是4点半以后就没有了座位，如参加9点钟的圣诞夜活动就要在教堂外等候，长长的队列延伸了一里多地，拐进了旁边的一条胡同。1997年的圣诞夜是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许多人在寒风刺骨中站了4个小时才进入教堂。为缓解这一局面，1998、1999年该教堂把礼拜由2场增至3场，但此夜晚在教堂外排队等候的人数仍然不见少。

<sup>③</sup> 在对福建省莆田市的基督徒调查中遇见的一位现任莆田大教堂刊物编辑的小黄在谈到他信教原因的时候说：我本来就知道基督教的，因为每年都有圣诞节，我们年轻人都是过这个节日的。有一段时间我做什么事都不顺，还因为在外边打架斗殴而在公安局挂了名字。一次，又路过教堂，听见里面的歌声很好听，就进去看看。基督教我觉得不象佛教，它是一个很新的东西，至少和封建迷信没有关系。我家乡原来是有佛教徒的，他们给村里的人看病，死人的时候作法术都要交很多的钱。这些都是封建迷信。我是不会相信的。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去教堂则是很时髦的事。后来，杨牧师发现了我和我谈心。你知道，当时是没有人来理我这个公安局挂了号的人的。慢慢的，我就信了教。他们还送我去福建神学院读书，我家里人都说信教以后我象变了一个人一样。先不论小黄说的对与不对，我们从他的谈话中至少可以看出基督教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他们对基督教的看法。因为是西方的东西所以觉得先进，因为是比较新的东西所以时髦，直到最终得到帮助而信教。

### 第三节 青年信徒信教原因分析之二：追求受挫后信教

青年是充满幻想和憧憬未来的年纪，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最多的年纪。但事实往往不如人意，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或主观期望的不切实际，一些理想并不能马上实现。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使人们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同时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和压力。党内的腐败现象、单位用人不当、工作不尽人意或下岗待业、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求学道路中的困难、个人及家人的病痛，以及个人婚恋中的挫折，都会导致青年人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之途，其中一些青年人在困境中得到宗教界人士及教徒的帮助而接近或走向宗教。

祁先生和王女士是上海国际礼拜堂里十分惹人注目的一对，因为只要他们出现在教堂里，教堂就一定会多一个刚刚会走路的小孩。老信徒都知道，他们是由于基督才走到了一起。由于基督才有了这个可爱的小宝宝。在一次青年聚会上有幸和王女士聊了起来，才知道了她的故事：出生于浙江的她考入了上海的某重点高校，在学校求学期间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于是便陷入了爱情之河。轰轰烈烈地四年爱情故事在毕业分配时终于发生转折，原因是男孩的家里要送他出国，而且不许他和王女士进一步的交往。“我当时真的不相信爱情会如此的不堪一击，他居然屈服于家里的摆布。他走后，我的伤心是无法形容的。”悲伤的她想起了他们曾经一起去过的教堂，在那儿他们度过了第一个不眠的圣诞夜。由于此后是孤身一人留在了上海，于是，工作之余便经常去教堂参加各种活动，有很多都是和教堂的义工做事，给不识字或有病的信徒念《圣经》。“当时我还没有入教，但就是对基督教教徒有一种亲近感，我知道我还在寻找初恋时那份已经远去的感觉。”后来，在牧师的帮助下，我上了牧道班，正式入了教。在教堂里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结了婚。新婚后，我们一直没有小孩，于是丈夫和我去了多家医院都没有治好。1997年圣诞节我和丈夫一起来到教堂专门为我们未来的孩子许愿祈祷。1998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带他来教堂，现在，只要我们有空来教堂就一定会带孩子来的。这里的牧师、老信徒都十分喜欢他。我感谢主给我的帮助，我也会让孩子今后信主基督的。

如果说王女士是因为婚姻生活受挫而入教的，那么，还有一些年轻人则是为了其他的追求受挫后转向基督教信仰的。在一次国际礼拜堂的青年聚会上，我和几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谈了起来，他们有的还没有正式入洗，有的是刚刚入教

不久的信徒。在谈到信教原因时，不外乎家庭的要求，自己的好奇心和自己无意中  
对基督的请求被实现而信教的。这其中又以第三种情况为最多。有的人是得到  
了自己想要的一份工作，有的是如愿以偿的上了理想中的大学，有的则是顺利地  
办理好了出国的手续。于是便以自己在求助时以身相许的诺言那样，以信教的方  
式来还愿。

### 第三节 青年信徒信教原因分析之三：文化上的好感信教

提起基督教以其文化吸引人们信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就有此风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能首先在中国立足即是以自鸣钟等“奇巧异物”通融当时的广东制台，使其“喜悦愈常”，“心为之动”<sup>①</sup>难怪利玛窦谓叹当时的社会风气道：“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sup>②</sup>

如果说早期基督教还是以一些西洋的器物来打开中国的大门，那么，当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则采用主动办学即教育的方式来吸引中国民众。在传教士来华后，不仅“风土人情不谙，语言文字隔膜”，更困难的是，他们所面对的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巨大障碍。美国传教士杜步西抱怨说，在美国用三、四周的时间就可以使一个城镇全部皈依基督，“可是在中国，改变一个城市的信仰需要三四个世纪。”<sup>③</sup>因此，教育不仅是“教堂、学校、医院”这一福音布道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扩大基督教影响的重要媒介。根据晏文士（CHARLES KEYSER EDMUNDS）在《中国现代教育》一书的报道，1918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统计已高达6000所，学生超过15万人，分布如下：<sup>④</sup>

学校类型	数目	学生人数
幼稚园	15	3, 196
初级小学	5, 276	133, 826
高级小学	575	19, 605
中学	233	12, 533
专上学校	28	1, 499
师范学校	56	不详
神道学校	31	985
职业学校	40	1, 409

<sup>①</sup>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徐宗泽 土山湾印书馆，1838年版，第171—172页

<sup>②</sup>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23页

<sup>③</sup>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AMERICA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2

<sup>④</sup> 此表转引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史静寰 王立新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的第1页

孤儿院	49	1, 544
-----	----	--------

这些学校具有宣教和教育的双重功能。正是这双重功能把教会和中国的一部分求知者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教会学校一方来说，西方的地理、历史、数学、物理等学科都是基督教的派生物，进行西式文化的教育有助于强化宣教功能；而中国的求知者则是从倾慕西方文化到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来亲近基督教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基督教教会学校到 20 世纪以后失去了垄断中国西式教育的优势而使得宣教功能不断弱化和教育功能不断强化的同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由向往西学进而皈依了基督教。马礼逊学堂可谓是一个典型。它于 1839 年在澳门由美国传教士布朗成立后又牵至香港。在这里，学生全面地学习汉语、英语、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力学、生理学、音乐等。此外，布朗在学校生活中极力培养一个基督教的气氛，透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改造中国学生灵魂的目标。“孩子与我的家人在一起生活，我待他们如同亲生儿子一般，做他们最好的朋友。鼓励他们与我们亲密无间，彼此信任。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参加我家的早晚祈祷。概言之，我们努力使他们感到是在家里一样，试图给他们一个充满基督徒家庭气氛的教育。”<sup>①</sup>在西式教育模式的培养和基督教家庭氛围的熏染下，许多学生不但形成了新思想新观念、批判传统，还有一些学生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象在工商界有重要影响的唐廷枢、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容闳、中国第一位西医黄宽等都曾是马礼逊学堂的学生。虽然，促使中国学生入教会学校的初衷有的是迫于经济压力，有的是一些偶然事件，但最终促使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却无不是发自内心的对西学的崇敬。

当代青年人也有一部分是由于基督教的被基督教的文化所吸引而信教的。当他们沉迷于《圣经》的神话故事，阅读着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托尔斯泰的《复活》等名著；或是欣赏着“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的基督教堂的建筑；在或停留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摩西像》、《大卫像》，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等艺术作品中流连忘返的时候，基督教文化通过融入这些艺术品而融入了青年人的心里。

还有一部分青年人是从小研究基督教而接触基督教，进而开始信教的。青年

<sup>①</sup> CHINESE REPOSITORY 10: 571 (OCT. 1841) 转引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史静寰 王立新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的第 65 页

处于求知欲最强的时期，改革开放后，当紧闭的国门打开之时，我国与西方的差距之现实，刺激了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热血知识青年；<sup>①</sup>为寻求使中国富强的道路，他们开始潜心于了解西方，研究其发展之路，此间他们发现了渗入西方世界、具有无处不在影响力的基督教。其中，一些人折服于基督教的超越精神和谦卑意识，并由此皈依基督教。<sup>②</sup>在这些“有文化的基督徒”眼中，基督教与文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彼此相通，并以此确认或质疑自己的信仰经验。这部分人与关切宗教的非教徒学者很容易沟通。据了解，这部分“有文化的基督徒”并不是宗教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其原因认为神职人员布道和宗教活动的水平有限，不能符合他们的文化需求。当然还有很多人成为了“文化基督徒”。所谓文化基督徒往往有较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自己本身不具备宗教信仰，但是对基督教有好感，他们将宗教作为文化现象，或者作为史学分支来研究，或者当作学科门类来探讨。他们从事的研究不以传教为目的，也不为某一教派服务。刘小枫博士称其人其事为“纯粹是人文学的旨趣”、“基督教学术的学者”、“一种非教会性的文化理论型的基督教学术”。<sup>③</sup>

在上海市的国际礼拜堂每星期三有一青年聚会。大多数与会的青年对基督教的文化及其书籍都十分感兴趣。这也是他们来参加青年聚会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到这儿来聚会，不仅可以听牧师讲道，使自己对教义有更深入的了解，还可以与其他朋友交流，使自己的灵性得到长进。下面是2000年7月26日对国际礼拜堂的青年聚会曾做的一个调查，其结果是<sup>④</sup>：

在回答“你认为基督教书籍对于你的重要性”时，80%认为十分重要，20

<sup>①</sup> 《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sup>②</sup> 《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6页

<sup>③</sup> 《共产党文化制度中的基督教学术》刘小枫，加拿大《维真学刊》1996年第二期，第17、20页

<sup>④</sup> 该聚会于当晚7:00—9:00在国际礼拜堂二楼进行，共有25位青年信徒参加，谢炳国牧师主持，调查是在休息期间进行的。另外在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金陵神学院的调查研究中我们着重对大学生信教情况作了了解。由于金陵神学院原来在南京大学设立宗教研究所的关系，基督教研究与南大一直有着不解之缘。1996年，香港某教会学校师生来金陵神学院学习访问，就和南大的社会学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据当时参加者回忆，仅仅20天的接触过程中，就有两位南大的学生立志日后要入洗信教，并有去香港该校进一步学习基督教的意向。今天的南大校园，离金陵神学院较近，神学院的师生对我们说，经常会有南大的学生来此看书、交朋友。而神学院的学生也特别愿意与大学生作朋友。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南大社会学系的一位研究生成为了我访谈的对象。他对宗教的兴趣来自于系里一位老师的论文，写的是杜尔凯姆的思想，从而接触到了杜尔凯姆的《宗教经验种种》，再后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一口气读完了韦伯、卢曼、贝格尔、卢克曼、刘小枫、何光沪、卓新平等人的书，从此对基督教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读研期间，除了完成导师的任务，他自己抱着自费印的问卷在南大校园和金陵神学院两校中调查青年人。撰写了相关的论文并发表。他对我说，他觉得基督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很有研究的价值，而且，国内研究的社会学学者不多，所以容易出成绩。过元旦的时候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已经入教了，并且打算去香港读神学博士。

%认为重要，没有人认为不重要。在回答“你认为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60%的人选择了没有冲突，可以共存，30%的人选择了相互弥补，共同发展，只有10%的人选择了相互间有一些矛盾，还需要不断调适。在回答“基督教文化对于基督教的意義”时，70%的人回答基督教文化是基督教的灵魂和不断发展的源泉，30%的人回答是基督教文化是基督教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人认为基督教文化对于基督教来说无足轻重。

对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说是青年基督徒的一个特点，同时也反映了青年人基督教文化的重视和基督教文化对于青年人的影响。

### 第三章 城市新群体信徒研究

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社会转型的继续，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经历着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最根本的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人们不再是吃大锅饭，抱铁饭碗，而是在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竞争促使社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行业和现象。在城市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一部分原来国营企业的职工下岗和大量的民工涌入。这些人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产物，因而也是遭受新旧两种体制和环境变化感受最深、矛盾最多的地方。这些新群体的出现即是活跃社会市场经济的力量，同时也是隐伏着不稳定的因素。而就这些人本身来说，他们自身的压力也是最大的。当旧的个体平衡体系被打破，他们在寻找新的自我位置时，接触与信奉基督教成了他们可选择的道路之一，或成为了他们人生失意时的精神力量。

#### 第一节 下岗工人

据劳动部门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停产半停产企业2.8万户，涉及职工580万人<sup>①</sup>。国家统计局统计，1995年上半年，全国停产半停产企业4万多个，涉及职工745万人<sup>②</sup>。《人民日报》载，1996年全国下岗职工约800万人。劳动部门分析，“九五”期间企业下岗待业人员达1800万人<sup>③</sup>。

对于社会稳定来说，下岗职工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源。国际上把6%的下岗率视为社会动荡的警戒线。据1995年辽宁省的统计，沈阳市共有180万企业职工，下岗放长假的达30多万人，占16.3%。<sup>④</sup>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健全中的国家而言，高下岗率潜伏着很大危险。职工下岗不仅严重浪费了劳动力资源，而且降低了下岗者及其家属的生活水平，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

国内有关学者曾对下岗职工的生活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sup>⑤</sup>，发现下岗职工的物质生活水平偏低处于拮据状态。恩格尔系数很高，仅米和菜两项支出就占人均

<sup>①</sup> 《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江流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sup>②</sup> 《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江流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sup>③</sup> 《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2日

<sup>④</sup> 《辽宁就业问题探讨》 辽宁省再就业对策课题组，《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

<sup>⑤</sup> 《社会弱者论》陈成文著，时事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92—96页

生活费的 76.1% 属于恩格尔系数中的“绝对贫困”范畴。下岗人员的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几乎为零，消费结构也不太合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旦有意外发生，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偏低，绝大多数下岗人员的精神、情绪欠佳，苦闷、焦虑、彷徨、悲观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特点。此外，下岗职工的家庭关系状况和健康状况都不尽人意。从调查的分析表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下岗职工的心理感受情况：

心理感受指标	有此感受 (%)	无此感受 (%)
感到苦闷、焦虑	97.2	2.8
感到悲观、失望	74.1	25.9
感到彷徨、不安	53.8	46.2
感到生活艰辛	67.4	32.6
觉得很轻松	2.1	97.9
觉得很幸福	0.4	99.6
对未来充满希望	16.2	83.8
觉得无所谓	11.3	88.7

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再就业工程、再就业培训等，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下岗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和下岗个人的生活困难。但是，我们也同时不得不承认，对于下岗个人的总数和影响面而言，这又是远远不够的。然而生活的困难，物质上的匮乏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原本生活、工作环境的变化给下岗职工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变化。也就是说那些重新就业的人由于思想上一时间还难以改变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国家政府的全面依赖依然感到精神上的不适应，甚至产生迷茫失措感。他们在重新寻找社会的依赖感、归属感的时候，就有可能选择宗教的解脱。因为基督教讲求人间的互爱，依其教义，这种彼此间的博爱，不仅是教徒之间的，还有非教徒的，甚至包括敌人的。身处困境的人们一旦获取信徒的帮助或感受到这种精神，便有参加教会的倾向，最终成为信徒。

张女士是在她周围的姐妹中信教较早的一个。1996年她因为只有初中的文化而成为原来的单位的下岗职工。由于家里以前是私房，上下三层，所以下岗后她把第二层的亭子间借给了别人，一个月也有600—700元的收入。所以，下岗在经济上并没有给张女士造成多大的威胁。只是从那以后，她不用天天上班了，一下子多出了许多空余的时间。开始还能应付自如，去自己以前想去但又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日子久了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了，钱也不允许这么花。“我开始和小区里的几个没事干的人搓麻将，10元封顶，一天最多赢也就30元，最多输也就10元。所以，我们不是赌博，就是消磨时间。”“可是老伴儿和孩子对我开始有意见了，说我不工作，游手好闲。你想有些工作钱太少，又很累根本不是我这样的上海人干的，真的好工作又要有大学的文凭，不是我不干，实在是没有活好干。他们和我闹别扭，家里开始不合了。”“后来，我们要闹离婚，因为这房子是我们家留下的，他看不惯我，可以走嘛。”“楼下的老赵退休在家，没事便上来劝劝，他们全家都是教徒，是我们弄堂里出了名的五好家庭。他带圣经给我看，给我讲夫妻之间的关系。后来，我跟他到教堂，找了牧师，认识了更多的姊妹和弟兄，他们替我祷告，帮我和丈夫调解关系，我们很好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慕道班、学《圣经》。现在我的亭子间借给了外地到上海打工的信徒，我一分钱也不收他们的。我自己也经常去信徒家、教会帮帮忙，生活挺充实，我们家有什么事了，也总是有很多姊妹来帮忙，所以丈夫和孩子说我开始学雷锋了，家庭关系也好了起来。”

张女士的话实在是发人深省，有着典型上海人思维方式的她，由于衣食无忧，工作高不成低不就，最终成了一个典型的社会人。而精神上的适应和周围人的接受却往往并不如变化来得那么突如其来。矛盾就此产生，冲突越来越尖锐，解决方案迫在眉睫。然而张女士又是幸运的，因为她毕竟碰到了一条可行的解决方案，化解了危机，充实了自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找到了自己和家人都能接受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平衡点，也许，对于下岗个人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 第二节 城市民工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二元社会，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由于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及时转移到其他产业，而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农民开始流入城市，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工潮”。这群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角色的“边际人”最低估计有6000万，最高估计数认为已达到1个亿。<sup>①</sup>由于他们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很少，基本上处于工作、吃饭、睡眠这种最原始、最简单、最单调的生活状态，与一般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相差甚远<sup>②</sup>。而且，面前我国的进城农民在就业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不得不接受雇主的恶劣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和不公正的工资待遇。<sup>③</sup>

另一方面，“从流动民工的收入分层结构来看，月净收入在201—300元和301—400元的民工占的比重最高，分别为28.0%和25.8%，其次是401—500元，占17.4%，200元及以下的民工占12.5%，而月收入在501—600元和600元以上的分别为5.9%和10.1%。”<sup>④</sup>此外，流动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不享有市民的一切权利，不仅在就业的社会福利待遇方式与城市正式职工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入托上学等一系列城市服务方面，流动民工都遇到比一般城市居民更多的困难。

面对一个新城市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些外来民工往往依赖同乡关系，是通过来自老乡的帮助来克服的。因此，因此同乡中如有人具备基督教信仰，那么便很容易在这个同乡关系构成的小圈子里传布开来。以进一步巩固和维系这种关系的稳定。当然，这个首先信仰基督教的人不一定是受地缘关系影响，他们有的是原来家族里就有信教的传统，有的是到大城市后，受到城市里基督教徒的帮助而信教的。

小郑来自于安徽，在上海做生意。刚来上海时，人生地不熟，常常在火车站过夜。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路过教堂，便进去看看。虽然认不了几个字，但是对于牧师的讲道还是可以听懂的，于是每个星期天都来参加。由于作礼拜的人每个

<sup>①</sup>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 贾裕德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sup>②</sup>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 贾裕德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sup>③</sup>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 贾裕德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sup>④</sup>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李培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星期都很多，他便在礼拜还没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在教堂门口不远的地方摆个小摊，卖卖从批发市场批来的小玩意，生意还不错。日子久了，教堂里有的信徒便和他搭话，有的托他从批发市场带些便宜的东西回来。当然，他们也给小郑不少的帮助。给他介绍基督教，讲圣经里的故事，帮他借房子住。慢慢的，小郑从无亲无眷、无依无靠到有了许多认识、熟识和关心他的朋友，小郑也顺理成章的成了基督教徒。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杂货摊，但是，每当一些知道他的老信徒请他买些东西时，他总是乐意地从批发市场带回便宜的货来。在小郑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妹妹和几个后来到上海做生意的老乡都信了教。和城市里的教徒一样，每个星期按时作礼拜。和城市里信徒不同的是，他们把基督教带回了家乡，信教一时间成了他们村子里的时髦事。而且，只要是信徒，那些先来到上海的信徒就会优先帮助这些人，使他们之间除了同乡关系以外形成了一个以基督教信徒为成员的更紧密的小群体，从而在上海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了一个可依靠和信赖的组织，使自己更好地生存。

在国际礼拜堂的青年聚会上，我也遇到几个来上海打工的外地年轻人。他们往往是三三两两结伴二来。他们说，在这儿可以交到朋友，上海的或是别的什么地方的。而平时，他们大部分只和自己的同乡接触。他们在教堂的团契活动中，找到了一种交流的机会和空间。外来的民工同样也渴望交流，渴望得到城市里人们的理解和认可。

### 第三节 城市新群体信徒信教原因分析

城市新群体信徒的信教原因不同于老人和青年人，因为他们产生的本身就是由于社会改革发展决定的，即是在从原来状态的社会人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下的社会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形成的。也就是说信教是他们角色转变过程中产生的结果之一。

根据社会学经典理论，所谓角色就是与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相关联的被期望的行为。这个表述包括了相互联系的三个部分。一是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即个人和与其相关的地位群体在一个社会体系中所占有的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相对而言的地位，或指在一个群体和社会中由特定社会关系因素所确定的位置。社会地位决定着权利、义务和主要社会关系，决定着同其他地位上的个人的关系的性质和程度，决定着一个人可能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二是社会身份。社会身份的原义是指某种不可改变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其典型表现是传统社会由“三纲五常”所规定的身份地位，这里是社会角色的同义词，是指识别一个特定社会角色的标记或手段。三是期望。期望也称社会期望或角色期望，它是指群体成员对自己和他人应有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的一种共识，也即指一个角色的社会公认的扮演方式。<sup>①</sup>角色既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又是社会关系的外在化。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会发生很大变动，社会身份也会不同，而对于同一角色不同的人，不同时期和地域又会产生不同的期望。因此，角色冲突便突显出来。包括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本人角色和其他行为者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两种时期角色转换时的心理冲突及矛盾等。

这些下岗工人原本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现在成为下岗对象后，他们的地位、身份都发生了变化，不如以前了。由于是从一种社会角色转变为社会地位下降的社会角色，这种转变除了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外，更带来了精神生活的苦闷。民工看似从农村到了城市，是一种较以前的生活有所提高的状态，但是，他们在一个与自己家乡文化、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异的地方也势必会有种种角色的不适应。一方面他们已经不能用农民的身份来要求自己，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土地可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能用城市人来看待自己，因为他们曾经生活的背景和目前的生活状况依然制约着他们成为城市人的途径。那么，他们只能以一种游离

<sup>①</sup> 庞树奇 范明林《普通社会学理论新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49—150页

在农民和城市人之间的一种状态来生存，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角色群。无论是角色转换也好，还是形成新的角色群也罢，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不同的角色之间的不同要求很有可能就会产生角色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角色与以前角色之间的。

产生这些角色冲突的背景是社会的变迁、体制的转化，但是，目前社会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手段去缓解这些冲突和矛盾。在这些矛盾中生活的现代人迫切地需要寻找一个化解矛盾的方法，哪怕只是倾听，哪怕只是倾诉，哪怕只是一种解释。基督教在这个意义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场所。

## 第五章 小结与问题探讨

### 第一节 小结

基督教是三大宗教之一，作为宗教，它有着和其他宗教一样的对整个人类生活的重大影响，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它在中国的生存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们一方面看到了许多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和事物，另一方面又遭遇到了一系列以前从未碰到过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宗教问题突显出来，在基督教信仰上尤为明显。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信仰基督教的原因的调查就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全文先从分析事物的现象着手，以上海国际礼拜堂为主要调查对象，辅及莆田大教堂和南京大学、金陵神学院的调查和资料。将信徒分为不同的群体：老年、青年、新信教信徒这样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分别对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生活年龄经历的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出不同群体的信教的原因。

老年人信教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由于家庭信教传统，另一个是在退出社会的大舞台之后在精神上的空虚，第三是由于年龄造成的不可抗拒的自身种种困难，包括经济、疾病、日常生活等。年青人信教则多是由于好奇。不仅是因为年轻而必然的一种对新鲜事物的憧憬，还包括他们在遇到困难时没有合适对象来倾诉或帮助。在他们眼中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中的时髦，这与出国热、圣诞热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正是出于对基督教的好感，当他们在学习、生活、工作中碰到困难时就难免使向基督教求助成为一条可以选择的途径。而那些信教的新群体则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文中例举了两种较典型的人——下岗工人和城市民工。下岗工人是在社会改革中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调整的必然产物，他们所遭遇的可以说不仅是他们的前辈所没有遭遇过的，甚至是没有想过的。下岗、失业对于一个仍然可以工作，仍然要肩负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经济上的负担自然不用说，精神上的压力也同样不容忽视。他们成了城市新贫困阶层，极需要社会各界和人们的帮助、理解和支持。而作为一个还正在改革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任何一个新事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健全它，于是，这些人便成了改革中的过渡产品。他们不能指望社会象计划体制中那样来统筹分配他们，他们能做的最明智的选择是从他们自身出发，来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最终来解救自己当前的处境。基督教的一些信徒偶然间帮助或是这些人接触到

了基督教徒的信仰，很容易使这种信仰成为他们精神迷茫时期的一种新的支柱。城市民工的处境或许更差，他们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衣食住行样样都有着困难，而在举目无亲的异乡，可提供帮助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他们有的凭老家就有的基督教信仰形成强关系纽带，有的则是在到上海以后老乡中的一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使他周围的人都信教。这样的直接结果是这些民工在异乡的纽带更牢固了，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

我们在此大致可把信徒信教原因分为以下几类：一、传统型；二、求助型；三、追求型；四、补充型。传统型信教原因主要是指受家庭信教传统影响而信教的信徒。在访谈和调查中，老年人因此而信教的占有很大的比例。虽然他们并不要求后代一定要信教，但是作为长辈他们的言行对下一代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属于求助型的信教原因范围很广，可以说是蕴含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信徒。因为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人们总会遇到困难和挫折，所不同的是前者可能包括了更多的物质上的内容，而后者包括了更多的精神上的内容。在寻求帮助的途径中，宗教是一种选择。特别是在宗教政策落实以后，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生活的恢复正常化，打消了人们过去对宗教的种种顾虑和看法。追求型的信教原因主要是指宗教在对人们精神关怀及文化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而信教。正如宗教会议宣言中所讲到的：“我们知道，宗教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然而，宗教可以提供单靠经济计划、政治纲领或法律条款不能得到的东西：即内在取向的改变，整个心态的改变，以及从一种错误的途径向一种新的生命方向的转变。人类迫切需要社会的和生态的变革，但是人类对灵性更新的需要也同样迫切。借助灵性力量可以提供一种基本的依赖感，一种意义的根基，终极的标准和精神的家园。”<sup>①</sup>以这种原因而信教的信徒主要是在社会中的青年。社会的开放，即使国外的先进的科技引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社会文化。这其中便包括宗教。在中国人同这些外国基督徒接触过程中，无意地便接触了基督教。也就是说，你即便不进任何宗教场所，依然会有接触基督教的可能，从而大大扩大了接触基督教的可能性。在国际礼拜堂的每次礼拜上，都会有外国信徒参加，而且身边往往陪伴着他们的中国朋友或同事。每个星期天的下午，还有一支全部由外国人组成的唱诗班在国际礼拜堂内唱赞美诗。吸引了

<sup>①</sup> 《全球伦理》 孔汉思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不少中国的信徒。被外国信徒影响最深的恐怕是非青年人莫属了。在参加多次国际礼拜堂星期三的青年聚会和青年信徒交通的过程中，不难证明这一点，大学生和外企员工最初了解和认识基督教大多是从身边的外国人开始的。加上前文所提道的“文化基督徒”，所以追求型的信教原因是现代人信教敌对一个重要方面。补充型的信教原因是指信教成为个体的一种需要来弥补社会现实中的不足。在社会体制的改革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今天，人们处于一种过渡状态，需要帮助和关怀。比如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保障体制对一些失业、下岗、老年人的生活没有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当遇到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的时候，社会救助又思索难以照顾到，这是基督教由于其探访工作和很强的组织性，便会伸出兄弟姐妹友爱之手，使信徒的生活在教会这样一个组织的保障网络中。

若从社会的层面来分析，人们信教的重要原因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建国中国的社会管理是党政一体化，政社一体化，政经一体化 的单一领导和管理模式。宗教等意识形态也是国家一体化的，宗教是服从于意识形态下的一种精神现象。但随着国家职能的转变，属于个人的空间越来越大。这时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是以前的价值观、文化体系所不能解释的。于是一部分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做出了选择，其中也包括了宗教的选择。

总之，通过对上海基督教信徒信教原因的调查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城市基督教徒信教的现象不是一天两天的产物，它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同时，它也是人们心理需要的一种要求所造成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社会背景下，社会本身就不再是一个封闭单一的肌体，而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多元化的社会。基督教以前一部分被压抑的生命力展现了出来，显得格外的突出。各种新情况、新现象、新事物的涌现，又强化了这一现象。使基督教成为人们孤注无籍时的一种选择。可是问题不仅如此，正如第一章所讲过的，我们研究基督教信徒的信教原因一方面是揭示原因之本身，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此来更好地探讨基督教、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便又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课题。

## 第二节 问题探讨

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以往有种种提法。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被普遍认为是二者关系的最科学的规范提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今后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所谓“相适应”包括如下含义：（1）宗教将自身的发展进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这个目标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致力于振兴中华民族。（2）“相适应”虽然具有双方互相配合的内容，但不是平等的相互配合，而是有主次之分。主要是指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要适应宗教。（3）党和国家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4）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抱着诚挚热心的积极态度。

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与中国社会适应方面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从教会本色化到三自运动，直到今天提倡的神学思想建设。基督教在不断的摸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督教发展和建设的道路。就目前而言，神学思想建设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课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况且如何将这些思想贯彻到每一个信徒，使他们能够真正从中国神学思想的特点来面对社会考虑问题，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关于社会机制的完善问题。从以上分析的信徒信教的原因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发展和转型迫切地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的相互辉映。我们应该不断地从信徒信教的原因中找出我们的不足和社会发展的缺失，从而不断地改进，使社会成为真正成熟意义上的社会，给市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最终也将进一步地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

关于如何满足市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中，可以说它几乎包括了全社会的人。面对当今已经是不可回避的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如何正确看待生活中的事物和事情的发展变化，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宗教、理解宗教，不再误入一些伪宗教的歧途。这些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了。

关于基督教负功能的问题。我们几乎通篇在叙述基督教乃至宗教在当今社会中所应有的一席之地，但我们也不可忽视这样一个时事，那就是宗教的负面影响。基督教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一样其社会功能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宗教可以调节中国部分信徒的不平衡心理，增加社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愚化教徒，使一些教徒的心态趋于保守、宿命和逃避现实；一方面宗教对教徒进行价值及行为

规范的整合，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容易形成以各教自身为核心的社会分化现象；一方面宗教增强了对外交流和往来，另一方面又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交往功能进行社会主义破坏的途径。因此宗教一旦走上极端主义，走上神秘主义，使宗教组织极端化就必然走向了反面。这是我们当前社会不得不防范和格外警惕的。

总之，基督教，就目前来说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缓解由于社会转型和改革中带来的一部分问题。当下基督教界提倡的中国神学思想建设，基督教与社会相适应等方针还可以起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对于宗教的研究和理解，我们从分析问题的原因入手还仅仅是个开始。正是因为有了一些研究和分析我们才发现了目前尚存的许多问题，才揭开了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新的篇章。

## 参考文献

- 1、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 2、布林·莫利斯《宗教人类学》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年
- 3、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 4、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 东方出版社 1996年
- 5、托马斯·奥戴《宗教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 6、刘小枫《道与言》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5年
- 7、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 8、杰克·古迪作序《家庭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
- 9、张志刚《走向神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 10、南乐山《在上帝面具的背后——儒道与基督教》 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 11、陈村富《宗教文化》1、2、3册 东方出版社 1998年版
- 12、袁方《社会学研究方法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 13、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 14、戴康生 彭耀《宗教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 15、罗竹风《人·社会·宗教》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年版
- 16、叶泽雄《社会理想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 17、陈成文《社会弱者论》 事实出版社 2000年版
- 18、李素菊 刘绮菲《青年与“宗教热”》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年版
- 19、《宗教问题探索》1984年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市宗教  
学会编
- 20、陈麟书《宗教的基本功能》，载于《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3期
- 21、陈泽民《基督教常识问答》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22、《金陵神学文选 1952—1992》 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

- 23、徐勇《城市特困老人生活及最低生活保障机制》载于《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 24、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25、《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 26、江流等主编《1994年—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 27、贾裕德等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28、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载于《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 29、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 30、孔汉思《全球伦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31、邢福增《从社会阶层看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载于建《道学刊》第15期
- 32、辛世俊：《审视宗教的新视角——功能分析》，《求是学刊》1996年第6期
- 33、尹韵公：《当前我国的宗教状况与社会稳定》，《沿海新潮》1997年第1期
- 34、刘忠卫：《目前我国宗教盛行原因之剖析》，《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 35、黄旭涛：《当代中国宗教热探微》，《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 36、叶小文：《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春季号、夏季号
- 37、朱晓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宗教影响力扩大原因探析》，《天府新论》1997年第5期
- 38、龚学增：《学习邓小平理论，深化对我国宗教五性的认识》，《中国宗教》1998年第1期
- 39、段启明：《试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内涵》，《中国宗教》1998年第1期

- 40、 龚小因：《中国教徒已超亿》，《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5期
- 41、 卢曼《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版
- 42、 约翰·希克《宗教之解释——人类对超越者的回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43、 George Ritzer <<Sociological Theory >>fourth edition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6
- 44、 Duane R. Monette, Thomas J. Sullivan, Comell R. Dejong <<Applied Social Research>>third edition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94
- 45、 James William coleman, Donald R. Cressey <<Social Problems>> fourth edition Harper&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90
- 46、 Elliot Aronson, Timothy D Wilson, Robin M. Akert <<Social Psychology>> second edition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97
- 47、 Rodney Stark <<Sociolog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 48、 James .W. Vander Zanden <<The Social Experience>> Randon House 1988
- 49、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1
- 50、 David Tracy, Bless Rage for Order: The New Pluralism in Theolog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 51、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America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 公开发表论文

- 1、“后方的空洞谁来补？——质疑男女平等”《社会》2000年5月
- 2、“访莆田大教堂”《天风》2000年3月
- 3、参与邓伟志主编的《离婚革命》2001年8月将出版（撰写超过5万字）

## 致谢

七年连续的高等教育使我受益非浅，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从一个被动的知识的接受者转化成了一个主动的学习者。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结构不断更新的社会里，也许你今天拥有什么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认为应该是你所拥有的不断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敏感程度，同时，如何做人也将是关系你今后生活、工作或是进一步研究的关键。所以，我不得不在此满怀感激之情对于那些给我赋予更加鲜活生命力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示谢意，他们有：教会我用科学方法去衡量社会问题的裘立平老师，通过他悉心的指导和帮助我才得以在课题中能较好地运用统计的方法和软件进行研究，并且这一方法将可以运用于今后的各种社会调查中，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还有现已退休的庞树奇老师，是他把我引领进了社会学的知识殿堂，特别是在课上对我的鼓励对于当时还是门外汉的我来说是多么的终生难忘；还有系里的李友梅老师、胡申生老师等，他们的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将是我一生受用的食粮。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邓伟志老师和李向平老师。邓老师社会活动繁忙，又始终关注国家社会大事，但他对自己学生却丝毫没有放松过。在与他定期的讨论中我们总会被他对问题探讨的精神所感动，被他看问题的深度所折服，同时也感受到他对我们期望背后的压力。李老师是我七年学习生涯的良师益友，他循循善诱，对学生严格要求。在此次课题的调查中无论是问卷还是访谈他多次亲历亲为，不

仅给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意见，更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学者的风范和榜样。对于涉及宗教有关敏感的话题他总是怀着保护下一代，同时又用一些迂回的方法来间接地达到目的。如果没有李老师的保护和帮助，这篇论文将不会在此与大家见面了。

最后，我将感谢我的研究生同学和家人，是他们给了我精神和生活的帮助，使我得以顺利地完成学业。

我深知，这个课题的研究尚属探索阶段，其中的一些研究资料还不尽完全，一些研究的视角和观点还很不成熟，所引的资料也尚有待发掘和丰富。还请各位评阅者多提宝贵意见。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想，这正是我一个新的起点。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学位申请人：潘颖斐

日期：2000年5月1日